

中国历代

名家流派诗传

费振刚〇主编
梁克隆〇著

诗传

平始太康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家流派诗传

费振刚

主编

正始太康诗传

梁克隆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正始太康诗传

著 者: 梁克隆 责任编辑: 刘树炎

封面设计: 王媛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 130022)

印 刷: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2

标准书号: ISBN 7-206-03491-8/I·206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000 册 定 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遥远宏肆 流韵清英

——简论正始太康体诗	1
诗 选	
嵇 康	
赠秀才入军·五首	58
述志诗	65
琴 歌	68
五言诗	70
幽愤诗	72
阮 翰	
咏怀诗·二十四首	80
刘 伶	
北芒客舍诗	113
张 华	
励 志	116
轻薄篇	123
游猎篇	129
情诗·五首	134
答何劭·二首	141

陆 机

拟古诗·十二首	142
猛虎行	163
君子行	165
从军行	168
豫章行	170
苦寒行	172
饮马长城窟行	174
门有车马客行	177
君子有所思行	179
齐讴行	181
长安有狭邪行	184
长歌行	187
悲哉行	189
日出东南隅行(或曰罗敷艳歌)	191
吴趋行	195
短歌行	199
前缓声歌	201
塘上行	204
壮哉行	206
赴洛·二首	208
赴洛道中作·二首	212
吴王郎中时从梁陈作	215
赠冯文罴迁斥丘令	217

答贾长渊·并序	222
赠冯文黑	230
赠弟士龙	232
为顾彦先赠妇·二首	234
答张士然	237
赠从兄车骑	239
赠顾交趾公真	241
于承明作与士龙	243
赠尚书郎顾彦先·二首	245
园葵诗	249
招隐诗	251
挽歌诗·三首	253
陆 云	
为顾彦先赠妇·二首	260
答兄机	264
答张士然	266
潘 岳	
关中诗	268
为贾谧作赠陆机	279
金谷集作诗	288
悼亡诗·三首	292
河阳县作·二首	301
在怀县作·二首	308
潘 尼	
赠河阳	314

赠陆机出为吴王郎中令	318
赠侍御史王元贶	323
迎大驾	326
张 载	
七哀诗·二首	329
拟四愁诗	334
张 协	
杂诗·十首	335
咏 史	351
左 思	
咏史·八首	354
招隐·二首	368
娇女诗	372
杂 诗	377

遥远宏肆 流韵清英

——简论正始太康诗

(一)

魏晋易代之际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灾难深重的历史时期之一。那种“假廉仁以成贪，内险而外仁”，可“名士少有全者”的历史悲剧，那种“重赏以喜之，严刑以威之”而“惧民之知其然”的是非颠倒；那种“竭天下万物之至，奉声色无穷之欲”的骄奢淫逸，与“非所以养百姓”的巨大贫富差别，总之司马氏集团为达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的一切，都如同漆黑的夜幕，笼罩着当时的大地。

处在这种巨大而血腥阴影之下的正始诗人，他们似乎已经脱却了“建安诗人”的光荣与梦想，他们似乎也只能在对玄学的追求中，崇尚庄老，高谈玄理。当然，作为哲学思辩上的探讨，特别是像对言、象、意等有关概念的完整阐释，对于我们民族在更高层次上的精神发展，对于我们民族语言表达能力与思维能力的提高，都具有极大的裨益。尤其是其中以王弼为代表的“哲学革命”，给予后代思想家和文艺理论家的启示与影响，都是明显而深远的。然而在当时，这种“哲学革命”却是由“文学革命”的不能继续造成的。或者可以这样说，鉴于统治阶级内部激烈而殊死的拼杀，一部分较为正直而清醒的失意文士，开始从正统的立场上脱离出来，转而寻求一种具有反叛色彩的东西；并且用一种与以往不同

的角度和方式，重新认识并阐释许多实在的问题，立身行事，著书立说。这或许就是“文学革命”被代之以“玄学兴起”的内在历史缘由！

重视哲学思辩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强调这种思辩的重要性，不在于必须要以牺牲文学特点与自身规律为代价，而在于它应当是一种思想与精神武装，从而在更高的层面上依据文学的特点与规律，运用语言，创造出更富于艺术魅力的形象与境界。倘若纯以哲学入诗，可却未参透玄理，没有诗的内容与外在美的形式，那么这种努力是不会获得成功的。这也许就是刘勰批评何晏为诗的道理，所谓“何晏之徒，率多浮浅”，^①当然是指其诗歌在艺术上的欠缺。

其实，就在“正始”之前的“建安时代”，诗坛曾有过一片星汉灿烂的辉煌。

“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子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籍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②

这是刘勰从诗歌发展的角度，对建安时代创作业绩的总结与赞扬。

“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③

这是曹植从诗人风范的角度，对建安诗人艺术风格所作的总结与赞扬。

“（曹植）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辉以自烛。”^④

这是钟嵘从艺术天才与贡献的角度，对曹植诗歌伟大成就的总结与赞扬。

建安时代，“总两汉之菁华，导六朝之先路”；这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这是一个中国古代诗歌的“文艺复兴时代”；这是一个“五言腾踊”，并且由五言诗高举着诗歌传统与现实精神火炬的时代。

用林庚先生的话来说，建安文学的伟大功绩在于：

“建安时代的文艺复兴，非特恢复了古代的诗坛，而且唤起了无数的诗人。他们歌唱出这个时代的脉搏，‘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是就作家的身份出现，这样作家当然就多了起来，屈原

曾经为诗坛带来了诗人，但是直到这时候才得到了真正的发展。对于这些诗人，时代要求他们能解放自己的思想感情，歌唱出爽朗有力的诗篇，自然也就必须要求他们要有骨气，这‘骨气’的形象的写出，就是建安时代历来被赞美的‘风力’，也就是中国诗歌中浪漫主义的光辉传统。……古代诗歌主要的两股渊泉，到此便统一为一个巨流”。^⑤

正始诗坛与建安诗坛相比较，显得薄弱得多。正始诗坛缺少建安时代的慷慨激昂，气韵沉雄；缺少建安时代的跌宕悲凉，骨气奇高。当然，正始诗坛也有它自己的特点，尤其是作为具有大家风范的嵇康和阮籍，他们是中国古代诗歌宇宙中不灭的星辰。

(二)

嵇康和阮籍，他们在继承建安时代精神传统的同时，还进行着艰难的哲学探索，而这两方面又都给予他们积极的创作力量。因此，嵇康和阮籍的歌唱，应当说是从更深层面上表现和抒写人的追求与人的理想，当然是作为觉醒了的，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的追求与理想；以及他们心灵上所承受的痛苦与磨难。

嵇阮作为被“建安风力”所感召的文士，他们理所当然地把具有真正觉醒意识上的人与诗人，视为最基本的条件。可是“就以作家的身份出现”这一点，对于嵇阮以及其他正始诗人来说，显然已经变得十分遥远，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放声歌唱。特别是由于司马氏集团的“大行杀戮”，环境也就

变得更加险恶。不仅如此，嵇阮以及正始诗人，他们除去面对屠刀之外，还要面对极大的欺骗。因为司马氏集团打出了“名教”的旗帜，蛊惑人心，欺骗士人，这就不能不使嵇阮以及其他正始诗人失望与愤慨。这样，嵇阮对“名教”，连同它的鼓吹者，都采取特别蔑视的态度。事实上也是如此，由于作为司马氏集团血腥屠杀的坚决反对者，嵇阮对残暴统治者的顽强斗争，也就鲜明地打上个人反抗国家、反抗社会的烙印。他们是在为着觉醒的个人，连同这些个人的起码尊严而斗争；并且是在性命尚不能保全的情景下进行的，这就更深刻地揭示出斗争的严酷性与深广的悲剧意义。

嵇阮虽然是作为觉醒的个体生命的独立存在而出现的；但是他们又不仅仅地表现为个体生命的单纯存在，因为在他们身上，还表现着一种绝大的政治与社会舆论的力量，一种生机与希望。建安时代，文人诗歌创作的“风力”所焕发出的“处士横议”之风，以及文人集团的兴起，不但把对个体生命的觉醒意识，提高到新的层面，而且更把政治与社会舆论力量的现实问题，也提到了具体的议事日程。因为倘若能够沿着这一层面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将是对社会民主政治的企求得以实现；对“贤者”社会的肯定也将不再满足于形式而追求其实质内容。因为“举贤授能”的清明政治，从来就是中国知识阶层所追求的理想；而“处士横议”的社会舆论力量的强大，就将为这种理想的实现，创造出可能的条件。所以，最高统治者对“处士横议”之风的渐劲，是不会姑忍的，特别是像以“大行杀戮”起家的司马氏集团。他们打出“名教”的旗帜，只是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而当某种自由势力可能会对其统治有所影响时，他们便丝毫不不会犹豫，必除之而后快。嵇康与阮籍，实际上是作为那种觉醒的、但尚未

成熟的社会舆论力量，也就是说作为自由势力的代表而存在的。嵇康临刑前，三千“太学生”的求助声援，或许从某种程度上，恰好说明了他在社会精神生活中所处的位置。钟会所说的“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以及“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⑥固然是罗织之辞，但其本质概括，倒也一针见血。他们不仅对嵇康如此，对阮籍亦复如此。何曾对阮籍嫉恨至极，“曾面质籍于文帝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⑦。

因此，嵇阮与司马氏集团，以及与当时社会的对立，不仅表现在个体生命的觉醒意识上，而且还表现在“处士横议”之风的自由精神上，追求反传统的道德精神上，以及与之并生的具有某种萌芽状态的民主政治精神上。正是这种尖锐的对立冲突，导致了嵇康的被害与阮籍的终生悲剧。嵇阮又都是对玄学有深入研究的哲人高士，他们对于个体生命的觉醒意识，不单纯是感性的，而且还充满理性色彩。特别是他们以理性观念来看待人生，直面人的生命独立存在价值，因而使他们对于生死、养生与游仙等有关问题的见解，也显得尤为“深切著明”。当他们从对个体生命的感性与理性认识，这样两个方面把握人生时，他们就更加大力推崇、颂扬那种超凡绝俗的人格精神。同时，他们更在探索精神世界的过程中，把具有人格意义上的“道”之概念写入诗中，用以宣传冲淡清远、游心太玄的思想与艺术境界。联系他们的实际遭遇，这似乎更能感受到他们所追求的道德精神与人格情操。嵇阮是目标高远，志向恢宏，极有理想与抱负的“仕人”。嵇康虽

“早孤”，但“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⑩阮籍也是“容貌环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门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⑪。嵇阮是如此伟岸，潇洒不羁，怀抱利器之人，可却偏偏遭逢那样一个时代；因此从内心深处，他们不能不感到生不逢时的痛苦与怀才不遇的悲哀。但是，他们的确是哲人高士，他们可以不为个体生命的痛苦所囿，而从得道者的精神出发，歌咏超越时空的理想，创造独特的具有魅力的形象与境界。这理想与形象、境界，寄寓着他们无比的热切追求与愿望，放射出他们探索生命过程中的真理之光。所以，从嵇阮的这些深情歌唱中，透过希望与绝望，理想与幻灭的旋律，我们更能把握到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以及奔放的激情，强劲的生机与力量。

嵇阮虽然都在反抗，但由于个性特点及其他因素的不同，他们的反抗方式也不尽相同。嵇康的性格比阮籍的性格刚烈，虽然王戎说他在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⑫可嵇康到底未能忍耐得住。当他一吐为快时，就显得特别激越，有一股振聋发聩之力。就连“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的冷隽发问，也可以感受到那不可遏制的情怀。阮籍虽然也不拘礼教，但他又能“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⑬，所以尽管他也始终面对危险，却未像嵇康那样遇难，而能保全其一生。

嵇康和阮籍是用他们的作品，也是用他们的生命与整个人生悲剧，抒发着个体生命的独立精神、觉醒意识，以及与

之相适应的更加深广的人生忧愤。他们不仅继承了建安的文学传统，而且还将先驱者的歌吟，创造出生动鲜明的形象与境界。特别是这些艺术形象与境界，带着哲学升华后放射出的灿烂光环，开辟出着重人的心灵与精神的崭新艺术园地。

(三)

刘勰以“嵇志清峻”^⑫标嵇康诗，又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⑬钟嵘说嵇康诗“颇似魏文。过于峻切，许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托谕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⑭

“清峻”作为嵇康诗的风格特点，主要是通过三个方面来体现的，即充沛激跃的情感与昂扬挺拔的阳刚之气；高远清玄的风采与雄秀壮大的境界；自然无为的一片天籁与冲淡渊然的精神追求。

嵇康是一个傲岸不羁，天真率直，个性强烈的诗人，所谓“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⑮《悲愤诗》中“感悟思愆，怛若创痛”，“咨余不淑，婴累多虞”，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吟，使我们确实看到了真情的诗人。“焕焕灵芝，一年三秀。予独何为，有志不就。怨难思复，心焉内疚”。诗人确实在真心地谴责自己，因为诗人所追求的目标未能达到，可机会却永远消失了。诗人痛苦、忧伤，他叹息个体生命的不再重来。但是，诗人更是高傲的，他绝不屈服，他要死得其所。“澡声沧浪，曷云能补”，他是把自己的品德完美，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幽愤诗》是诗人对自己悲剧人生的回顾总结，也是诗人面对死亡而无所畏惧的壮歌。他把“养素全真”的理想追求贯穿于他生命的始终，因而在诗中，他也分别用

“内负宿心”、“神辱志沮”、“穷达有命”、“安乐必诫”来概括自己的人生不同阶段。嵇康笔下的《幽愤诗》犹如一曲情绪昂扬，节奏鲜明，充满阳刚之气的命运交响曲。它有抚今追昔，更有畅想未来；它时而哀怨，时而激跃，然其大气凛然，光明磊落，以及主旋律的上下起伏有序，抑扬收束有方则是固定的，因而把错综繁复的情感与无尽的哀思有机地编织在一起。钟嵘所说的“过于峻切”或许是真的，但细揣嵇康诗，那种“矢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意味，则是异常突出的。而激越、亢奋的“峻切”，恰好谱成他独特的阳刚之歌。

嵇康是追求目标远大的人，因而呈献在诗中的高远清玄的风采与雄秀壮大的境界，也是异常鲜明突出的。这构成了体现他“清峻”风格的第二个方面。嵇康诗之大流，很有一种茫茫然不知所向，浩浩乎不知所止的气象与壮阔雄浑。《琴歌》中那“凌扶摇兮憩瀛洲，要列子兮为好仇。餐沆瀣兮带朝霞，眇翩翩兮薄天游。齐万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的歌唱，横绝云霄，其游乎上下天地万物的胸次和所创造出的境界，被完整地置于鲜明而生动的画面当中。诗歌所创造的境界如此，那形象也都气势恢宏、超凡绝俗，具有“志气所托，不可夺也”的精神风貌。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

流磻平皋，垂纶长川。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钓叟，得鱼忘筌。

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嵇康《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十三章》)

这首诗集中体现出诗人的人格形象与内在精神。“秣马华山”、“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游心太玄”，固然都是阔大与高远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形象与境界，又都被赋予得道者的风采于其中，因而就尤显得风流绝佳，别具韵味。这些形象与境界，突出地表现了诗人的“贵得肆志，纵心无悔”；而“肆志”与“纵心”的结果，也使所有的形象与境界都充满雄浑的浩然之气。

嵇康从追求得道者的最高原则出发，他把自然无为、一片天籁与渊冲的精神境界，当作自己人生与诗歌创造的必然归宿。所以，嵇康笔下的描写，无论是勾画景物，还是雕刻人的性格，都带着玄言家在自然中寻求理性精神的色彩，仿佛是含着微笑的一种慰藉、一种满足。这种渊然冲淡，或者说空灵色彩的自然天成，就是体现嵇康诗风格的第三个方面。

嵇康《五言诗三首·其二》：

“修夜家无为，独步光府侧。

仰首看天衢，流光耀八极。

朱紫居玄黄，太素贵无色。

渊淡体至道，色化同消息”。

这种“渊淡”的色彩与光辉，闪烁得格外美好。

“何为人事间，自令心不夷。

慷慨思古人，梦想见容辉。

愿与知己遇，舒愤启幽微。

岩穴多隐逸，轻举求吾师。